

L4005 歐洲百科文庫 *Que sais-je?*

革命社會學

Sociologie des Révolutions

著者・A.C. Decouflé

譯者・賴金男



法國大學出版社 (PUF) 《Que sais-je?》文庫 1298
Sociologie des révolutions
André-Clément Decouflé



ISBN 2 13 037792 0
Dépôt légal 1^{re} édition 1968
3^e édition 1983, juin
©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8
108, Bd Saint-Germain, 75006 Paris

《歐洲百科文庫》⑤

革命社會學

譯者 賴金男

主編 吳錫德

責任編輯 羅麗芳

發行人 王榮文

出版發行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 10714 汀州路 782 號 7 樓之 5

郵撥 / 0189456 1 電話 (02) 392-3707

fax: (02) 3410760

法律顧問 王秀哲律師

嘉義市忠義街 178 號 電話 / (05) 227-3193

* 本書經法國大學出版社 (PUF) 授權譯為中文全球發行

印刷 優文印刷廠

臺北市汕頭街 54 巷 42 弄 55 號 電話 / (02) 306-3473

1989 年 3 月 16 日初版 (印數 1 ~ 3000)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295 號

售價 95 元

土黃 / 宗教・哲學 紫 / 心理・教育 紅 / 社會・政治
綠 / 科學・戲劇 藍 / 文學・歷史

作者簡介

德古弗雷 (André-Clément Decouflé) 法學及政治學博士，為大學教授、「應用展望學實驗室」(1971) 創辦人。著作有：*Sociologie des révolutions*, 1968.《革命社會學》；*La Commune de Paris*, 1969.《巴黎公社》；*La Prospective*, 1972.《展望學》；*L'an 2000*, 1975.《西元二〇〇〇年》等。

譯者簡介

賴金男，1964 年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1972 年巴黎大學「第三階級」博士。曾任巴黎第八大學教師、淡江大學法文系主任，現任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專任副教授。主要著作有：《未來學導論》《中國現代史》（驚聲）、《明日的訊息》（照明）、《東歐政治經濟之現況與未來趨勢之研究》（交通銀行、淡江大學）；譯有：《大變動》《大預測》（長河）等。

主編的話

吳錫德

「泰西文明」，是個教近代無數中國人憧憬、迷戀、甚至迷失的字眼。迄今，歐羅巴思潮不減其魅力，對我們仍舊有著強烈的吸引力。然而我們都有一種感慨：爲什麼不能更直接地瞭解這個近代世界的主導文明？遺憾著未能接觸到更完備、更有系統且深入淺出的介紹。

近百年來，即不斷有放眼天下的中國學者呼籲重視歐陸思潮，甚至終其一生力行不怠地譯介西洋文明。但由於文化水準、生活形態的懸殊，和社會長期的動盪，實難有具體的進展及全面的認知。二十世紀的歐洲發動了兩次慘絕人寰的戰爭，不僅滿目瘡痍，甚且幾爲外界所遺忘；直到最近三十年才又奮起圖強，教人刮目相看。這究竟是借助何種動力？它的歷史形成、它的發展過程、它的未來影響，對這些變化我們實在有必要投下最起碼的關注！

《歐洲百科文庫》譯叢的出版，目的是引介當代西歐人文思潮，對其淵源、形成、發展、應用、動向及影響加以介紹，尤其偏重引介當前最新知識焦點，或將可以彌補過去數十年「重

美日、輕歐洲」的偏食現象；以及因為資訊不足、認識不清所造成的隔閡、誤解等缺憾。我們將以精選的題材——目標一〇〇〇種，以普及本的形式、嶄新的編排，期望真正達到普及大眾、人手一冊的理想。

至於率先選上「法國大學出版公司」(P.U.F.)的榮譽出品：《我知道什麼？》(Que sais-je?)，理由無它，因為它是被翻譯成最多外語（三十八種版本）、公認是最全備（總冊近二四〇〇種）、最深入淺出（自學用書），也是最具歐洲觀點的普及文庫（法文版總銷售量六千萬冊）。它以百科全書項條（century），每本一二八頁的方式，每年出版新書一〇〇種（舊版增補一百餘種）的速度，介紹當前的每一個重要觀念。它的題材包羅萬象，理論與實用並重。作者以大學教授、各行專家為主，立論皆獨立自主，寫作嚴謹、力求博大精深、雅俗共賞。選題多元化、國際化，旨趣即在提供二十世紀人們最新資訊和省思的要素，並指引踱向知識和自由的道路。它的豪語是：「讀此書勝讀千頁巨著，讀罷此書欲窮千頁巨著」。

總之，社會邁向新的轉型期，允許我們提供新的選擇；社會財富的累積、民衆經濟能力的躍升、視野的開拓、社會參與意願的提高、新資訊的渴求日殷，在在鼓舞我們多去嘗試多元化的文化導向。正是有了這些有利的因素，我們才勇於在此時此地向讀者推介這套譯叢！

譯序

陳嘉庚

法國的民主政治是最漫長、也最坎坷的；因此，兩百年的革命史上，從第一次（一七八九年）到最近一次（一九六八年），足足相繼一百八十年；我個人有幸是一九六八年「五月革命」的見證者，我得承認，那是改變我思想和生命的經驗。

一九七二年夏天得到學位；受淡江大學當時校長、現董事長張建邦博士之聘，立即出任法文系主任；受到我國僵硬制度，我「不能」教中國語文，也「不能」教歷史，五年多期間，我從大一法文，教到商用法文，只要找不到教師的課，我都得擔任；因此，教過文學史，也教過法國史！

「教學相長」一直是我所深信的，就像我目前的專長之一「未來學」，也是教了十四年的學習成果呢！

由於高中二年級時就決定了從事教書這一行——雖然後來，也有從商或從政的誘惑，但是，如今已經不能再變，只有以「教書、讀書、寫書」為未來三、四十年生命的主要生活內容了——也因此，我也會從事一些「譯書」的工作。

《革命社會學》是「遠流」《歐洲百科文庫》的第一批十冊之一，承蒙主編吳錫德君厚愛，也容忍了最後交稿期限，總算交了差；行文中，有一部分，我自己也不太滿意；或是原文句子結構太過古典、太過於「法國」，實在用中文很難順暢表達；或是由於我個人對法國歷史和社會學的學養不足所致。但願可以在再版時加以修訂。

《革命社會學》一書提了革命的「自發性」和「普遍性」的理論，提示了群眾心理的衝動性與盲目性；所謂的「革命計劃」是一個可變的、適應性很強的結構；至於作者在第三章所提出「反革命」的理論中，特別有「語言暴力」一節；鑑於今日國內政黨政治發展實況，總有值得參考的價值。但是，最後，我總相信：美國當代思想家富勒（Richard Buckminster Fuller）說的：「歷史不能給我們成功的楷模，只能給我們失敗的教訓」的說法。在翻譯了這本書後，得到了一句話的印證，也是一種智慧的收穫吧！

目錄

主編的話

緒 序
論

第一章

革命計劃

第一節

革命與整體社會

① 全體性貧窮的例子

② 殘存性貧窮的例子

第二節

革命計劃的基本特性

① 革命計劃與全體性

② 革命計劃與史實性

第三節

革命計劃的社會學指標

① 測量指標

一

二二

二三

二七

三〇

三四

四一

四九

七一

七一

②象徵符號與政治現象

七五

第二章

革命行動

八三

第一節

革命行動的自發性與自願性

八四

第二節

革命的日常性結構

一〇八

第三節

革命政府

一二八

第四節

革命後的日子與革命退燒現象

一四〇

第三章

反革命社會學

一四九

第一節

反革命的兩種類型

一五一

第二節

反革命計劃

一六三

結
論

一七一

參考書目

譯名索引

二七五

二七九

緒論

「革命是躲藏在教授們的背後，在他們學究式又隱晦的句子背後？或者在他們提出的重大又煩人的週期中呢？」

——恩格斯（F. Engels）

《論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之結束》

社會學者全體一致似乎都有這種觀察：社會學是法國大革命的產物，可是革命社會學本身卻受到法國如此的忽視。一七九七年，法國文學家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在倫敦出版了「歷史、政治與道德對革命影響與法國革命之關係」一文，這篇論文是建立在比較方法上，是當代社會學所不能否認的。從現代簡單的觀點，這篇論文提示了：「**革命是歷史斷層**」

的說法，是分斷時間的山稜線，在革命前後與革命後，思想、風俗習慣、好奇心、法律、甚至語言等都是絕對的敵對，並且表現了不可妥協性^①。他把革命確定在他的原始物質空間裡：這是一位神祕建築師隨著無限大的圓周畫的圓——他是一位神或者一個民族。夏多布里昂把革命描述為被「某種事物的飢渴浪潮」扭曲的，並且把這種飢渴和歷史聯繫起來。他的看法長久以來被十八、九世紀法國文學「地下咖啡室」清談的意象所埋沒——因為，文學家的見解被列為科學研究資料實在有些太離譜的。因此，我們可以發現，有多少關於法國大革命的史籍，到了今天，仍然只是一些無意義的、爭論的材料；頑固思想使得我們對許多問題茫然不解，譬如革命的原因^②，以及革命前因後果的年限——法國大革命是一七八九年開始的嗎？影響是否會延續到今天呢？

這些爭論，比起「丹東派」(Dantonistes)和「羅伯斯庇爾派」(Robespieristes)，少了一點人的因素：嚴謹的說，舉凡訴諸一個社會學的分析時，社會學就具有模稜兩可的意義。

在此，似乎就可以得到一個較少受人爭議的結論：有許多以系統分析或比較法研究革命的人，都將革命的主要特性縮減成一些簡單的建構，有了這些建構，各種革命就可以有效的比較，其中大多數的建構都冠以「革命社會學」。在這塊「招牌」下，流動著產地、重量和

價格都極為不同的商品；最普遍的是都蓋上了「意識型態」的戳記，每一學說可自以為偏見最少，因此表示了文字的情感負荷的永恆性，甚至也顯示了許多革命精神中的不變性。

要看清楚法國大革命是件很難的事，要瞭解而不牽連到所有革命者和反革命者對立的關係更難。

一位專門研究工業化歐洲革命現象的專家，也是最近著作最好之一的作者，這樣寫道：

「這類革命現象都有一個特性，那些不瞭解這些現象所代表意義的人，無法說出這些意義是什麼，可是那些瞭解的人，又無法用一種讓人理解的方式說出。」^③

事實上，在描述的措辭中，革命社會學冒著一些風險：譬如「根據某人寫的、或某人讀到的」，文章措辭就會變得簡化或帶有影射，或者，並沒有那麼重要，卻自我局限在一個普通的分類中，又譬如有些人以為，隨著自己對革命知識的增加，認為革命領袖分類是不重要的，於是有人把革命領袖分類為：知識分子、手工業者、城市市民、農民、文人或軍人等^④；又有人以為嘗試將一些模糊的概念確定是不重要的，就以很普及的「革命力量」為例，不少論點以為「革命力量」是來自一種潛在力量，是一種「集體沸騰行動之火」(G.

Gurlich)所引發的，並且存在於世界之中。這些革命力量，有時是工人階級、有時是農民階級、有時是手工業工人和小商人，有時卻是資產階級的整體——如馬克思就認為反資產階級為革命力量的第一要件；又有人以為：革命力量是在領袖指揮呼籲下動員，在所謂革命壓力下動員起來的，那麼，革命力量也就是自發而又自然的以全部力量發揮出來。

就是上述這些標準化的「唯名圖解表」，阻滯了多少社會學的論述。

至於，「革命社會學」在擁有自己一套共通的術語前，有本身的一套「蠢語錄」，如大家熟知的：「革命精神」來自「意識的覺醒」；「革命情勢」這一片語中，用「革命」當形容詞，可以免去許多說明；「革命信心」則只有一段特定時間，您要感到興奮或惋惜，隨您意思……。法國近代哲學家梅洛-龐蒂(Merleau-Ponty)就揶揄過「革命榮耀」，指責為「只不過是資產階級尊嚴的一個變相」(見《人文主義與恐怖行動》, *Humanisme et terreur*)，並且希望人們不要把革命英雄的行動和思想縮減為如此低俗的一個片語，譬如馬勞侯(Malraux)作品《人類處境》(*La condition humaine*)中的主要人物：橋(Kyo)、梅(May)、陳(Tchen)甚至於吉索斯(Gisors)。革命社會學探索的領域受到悲劇的影響，也就是人的希望、戰鬥和死亡，他們是不能用社會學者習慣用來分析人的分類法加以定位；假使一如卡斯楚(Fidel Castro)，經常

提醒的「一位革命分子的責任就是搞革命」，那麼革命社會學者的責任就是要避免標準式的陷阱，同時拒絕下列兩項行爲：

(1) 拒絕回答一些太過無聊的問題——經常會有人匆促向他提出的，譬如：在那些條件下，一場革命才會爆發？（針對這個問題可以有一個一樣無聊的答案，如：蘇俄革命是在一個「落後」國家成功的，和馬克思理論架構剛好「相反」，舉出原因大作文章；一些現成的回答只是來自一種匆忙的研究，因為一方面，那些「俄羅斯基金」[fonds russes]的持有者就不會隨便支持俄國在一九一七年是「落後」國家的說法，另一方面，俄國大革命並不是神奇般成功了，而是漸進的在這個幅員廣大的國度，百折不撓的進行，歷經一代時間才奠定基礎。）又如：如何爲人民和由人民「革命的」治理國家？（這些問題都是純屬主觀特性，從問題句子中的詞眼就令人迷惑。「爆發」、「爲人民和由人民」——或譯爲「民享」與「民治」——是什麼意思？況且「革命的」這一個副詞呢？可是，人們要找到另外一個方式來表達也是很困難的。）總而言之，革命理想主義者和理論家所處理的許多問題，革命社會學者也只能用一些帶有革命教條的社會學的偏見去討論，唯有如此，這些革命教條才可以在十九和二十世紀正值工業化的西方社會中，將「布朗希主義」(Blanchisme)、無政府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甚或正統馬克思主義加以定位。這些革命教條，毫無疑問，也可以協助人們瞭解，在今日不同社會空間中——如那些正在奪回

主權的國家——那些同樣的理想型態遭受扭曲的意義和程度。

(2) 拒絕選擇經由全盤革命方法的特殊觀察所得的資料，也就是那些形成革命整體世界的人、行動、思想、形象、理想型態和詮釋……。革命社會學對下列兩件事要視為同等重要：①拒絕和各種革命教條混為一談，②在它的論述中，從頭到尾的整體分析中都要警覺到盡可能的態度堅定且思想獨立。正如摩斯（Marcel Mauss）說的「革命是整體社會現象」，在革命中人們「可以作整體思考，發現最重要部分，全體的運動，生動角度，轉瞬時間……等都可以讓人在那裡對自己做感情的覺醒，也覺醒到自己和他人的相對情境。」（見《論天才》，

Essai sur le don）

在這些情況下，革命社會學要去分辨革命現象和其他社會運動之異同，進而想為這些革命現象找到一個適當知性基礎，並且獲得一些解釋架構，就自以為可以增加精神和社會變化龐大領域的知識，這是不夠的。革命社會學也不能只想作一些革命模式的描述——所謂「標準革命模式」是不怕不會成爲一種「理想的革命」的——因為可以藉助「理論家的桌子」通過贊成（梅洛·龐蒂語），給各種革命找到一個理由、一個「法則」——是孟德斯鳩（Montesquieu）的定義，指的是一種「可互通的意義」。假使革命社會學可以成爲精神和社會變化的

社會學的典範——毫無疑問人們所同意的，是從這個分析階段；況且正如迪維諾（Jean Davignaud）所說的，社會學要是支持這種論調，那麼「這些特權知識分子」的「實驗場地就得以社會經歷危機的參與程度來衡量」（見《社會學導論》· *Introduction à la sociologie*），也就是說，革命社會學持有的哲學規範問題就不可以避而不談，革命社會學本身特性的公約也不能分別處理了。

上述的堅持，由於減縮為模式的嘗試與失敗，提供了可接受的說辭；我們看見的模式都是以法國大革命為靈感的研究結果或大綱所設計繪製的，譬如：古老社會統治階級的最後一次反擊（皇族或貴族的反叛），接下去是資產階級革命的第一階段，不久之後，被民衆革命的浪潮所掩蓋，可是這個民衆革命浪潮在一個「熱月黨」（Thermidor）式的團結號召下結束了——這種「熱月黨」是團結了民衆革命的資產階段革命的混編運動，往往（也有時不是）由一個獨裁政權為代理。以上架構是布林頓（Crane Brinton）在《革命解剖學》（*The Anatomy of Revolution*）所提出；早在托洛斯基（Trotsky）的《背叛的革命》（*La révolution trahie*）一書中已經把史達林在俄國奪權視為「蘇維埃熱月黨」了。

在這裡是有點誇大其辭，但是假使革命社會學可以獲得一個教訓時，那就是：它必須有